

# 哲学对管理研究的作用

□ Eric W. K. Tsang

**摘要：**“哲学对管理研究有什么作用？”本文通过追溯自亚里士多德创立科学以来哲学与科学的历史渊源回答了这个问题。两者的密切联系表明哲学在科学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管理学属于社会科学，哲学也可以对管理学发展起到类似的作用。本文以笔者已发表的文章为例，从方法论和概念性问题两个角度讨论了哲学对管理研究的贡献。本文还分享了笔者学习哲学的经验，并为有兴趣深入了解哲学的读者提供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西方哲学；管理研究；方法论；科学；逻辑

约20年前，笔者发表了第一篇关于复制研究与理论发展的哲学基础文章（Tsang & Kwan, 1999）。自那以来，笔者运用哲学解决了许多管理研究方法问题和概念性问题，相关文章见诸各大管理学顶级期刊。本文将着手解决一个问题：哲学对管理研究有什么作用？笔者对西方哲学的了解更深入，因而本文围绕西方哲学展开。根据向期刊提交哲学稿件的经验，管理研究者的哲学知识往往非常有限（Tsang, 2013）。笔者已经尽量减少阅读文章写作所需的哲学知识。这种缩减固然存在一定的局限，但在文章中给出所有哲学术语的定义并不现实。建议读者碰到不熟悉的术语或费解之处时，自行查阅相关的文献。

少有管理研究者认识到哲学与企业研究之间的紧密联系，特别是哲学与管理研究之间的紧密联系。其实，每一位管理研究者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持有一种哲学观点。哲学与管理研究的联系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本体论（ontology）和认识论（epistemology）。研究者对于现象的基本性质的看法便体现了其本体论承诺（ontological commitment）。本体论关注构成事实的实体、这些实体的分类和联系；认识论关注研究者如何获取和处理知识、如何创造和证明其提出的知识主张。研究者的本体论承诺会影响其认识论倾向，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立场共同影响着研究者对实证研究的评判标准（Tsang, 2017）。

在讨论西方哲学对管理研究方法的贡献之前，须确定管理学是否属于科学。本文

首先确立了大多数管理研究者认为自己在从事科学（更具体地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提。其次，本文追溯了科学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两者的密切关系阐明了为什么哲学能够有益于管理研究。再次，本文将讨论哲学如何解决某些方法论或概念性问题。最后，本文对管理研究者提出了一些建议。

## 一、管理学：一门社会科学学科

Thomas (1979: 2) 对“科学”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定义：“一项研究要被称作科学，其观点必须经受实证检验，并且至少存在一个强有力的检验标准可以接受或拒绝这个观点。”<sup>①</sup> 不同于自然科学，管理学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学科。管理学奠基之作——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1911) 通过书名向读者宣示：书中的内容具有科学性。Perrow (1994: 192) 回顾管理学在 20 世纪 20 年代至 50 年代的发展后，认为“管理学已被普遍认为是一门科学”。Perrow 所说的“普遍认为”体现在管理学顶级期刊的命名上，如《管理科学季刊》(*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决策科学》(*Decision Science*)、《管理科学》(*Management Science*)、《组织科学》(*Organization Science*) 和《管理科学评论》(*Review of Managerial Science*)。最新的一本权威期刊为 2016 年创刊的《战略科学》(*Strategy Science*)。

《管理科学评论》(RMS) 的使命是“为企业各个科学领域的创新研究提供平台”，“为保障科学，RMS 严格执行双盲同行评审，

评审过程由临时评审人员和期刊的国际编委会完成”。《管理科学》的发刊词也强调了管理研究的科学性：“与其他真正的科学一样，管理科学创造了一个可扩展的概念和原理框架” (Smiddy & Naum, 1954: 31)。“真正的科学”对应“伪科学”——其他领域的研究者可能认为管理学是伪科学，令作者感到十分焦灼。约半个世纪后，一些管理学者认为已经不再需要对管理学的科学性作出阐释，理所当然地将管理学划入了科学范畴。例如，Rousseau 等 (2008: 475) 在摘要中提到：“本章提出了在管理与组织科学领域进行系统研究的良好科学方法。”总而言之，许多管理研究者希望自己的研究被认为是真正的科学，希望自己被认可为科学家。

管理研究者对“科学”的渴望并不出奇。美国是正式商科教育的起源地，美国商学院的历史发展体现了管理学跻身科学之列的强烈愿望。1959 年，著名的卡内基-福特报告 (Carnegie and Ford Report) 使高等商科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商学院开始摆脱“职业学校”的污名。其中一个值得称道的变化是使商学院变得更加学术化，让管理学成为科学。Chalmers (2013) 在其畅销著作《科学是什么》的开篇中提到：“科学很受尊重。”自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革命开始，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发展迅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增进了人类社会福祉。为管理学戴上“科学”帽子，有利于商科赢得尊重。

管理研究者研究的是社会现象，因此管理

<sup>①</sup> 除了 Thomas 的划分标准，研究者也常用 Popper 的“可证伪”和“可复制”两项标准来判断一项研究是否科学。在科学哲学领域，“科学”的界定问题是一个复杂而富有争议的话题。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 Gieryn (1983) 和 Resnik (2000)。

学应当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从批判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个关键不同在于：自然科学研究在封闭的系统中进行；“在这个封闭系统中，存在一系列一贯的事件，即事件 a 的发生必然伴随着事件 b 的发生”（Bhaskar, 1978: 70）。实验室就旨在创造一个封闭的系统，方便研究者观察到事件常规的顺序。但是，社会科学研究很少能在封闭的系统下进行。人类行为不断地改变着社会系统的结构，社会系统是开放的（Sayer, 1992）。而且，管理学理论还会改变实务界的信念和价值观，进而逐渐破坏研究者所观察现象的稳定性（Ghoshal, 2005; Numagami, 1998）。社会系统具有开放性，“即便理论正确，假设所有相关数据都与理论一致也不现实”（Liebersohn, 1992: 7）。管理学等社会科学理论本质上是解释性的，并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偏重预测性<sup>①</sup>。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另一个关键不同是主客观之间的联系，自然科学只涉及“单向的诠释”（Giddens, 1976），即对自然现象的解释是研究者单方面的努力。社会科学则不然——社会科学是“双向的诠释”。研究者还需要阐释被研究者自身的主观理解，因为被研究者的理解和感受也是研究对象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Danermark et al., 2002）。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存在差异，但这并不意味着两个领域应该采用不同的标准来指导研究或评价理论（Bhaskar, 1998）。以可复

制性为例，人们常认为，可复制性是检验真正的科学知识最重要的标准（Rosenthal & Rosnow, 1984）。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应该遵循可复制性。这一点将在本文后面详细阐述。

综上，管理学期望被社会认可为一门（社会）科学学科。这样，大多数管理研究者便可以认为自己在进行科学研究。Pfeffer（1993）指出，管理学要成为科学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在将近 30 年后的今天，这一判断依然成立。有趣的是，一些持有激进的后现代主义立场的管理学者也想要贴上“科学”标签。他们创造了一个自相矛盾的词汇叫“后现代科学”（post-modern science）（Chia, 1996）。这个词之所以自相矛盾，是因为科学建立在我们对理性的自信之上，而后现代主义运动则是“攻击理性的反启蒙运动”（Hicks, 2011: 23）。总体上确定了管理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后，本文接下来将讨论哲学与科学发展的联系，尤其侧重讨论西方哲学与自然科学发展的联系。

## 二、哲学与科学的关系

西方哲学起源于古希腊<sup>②</sup>，从一开始便与科学有着紧密的联系。本文以下部分将按照时间顺序呈现两者的联系。这个话题涵盖的内容非常丰富，本文仅作简要介绍。

### （一）希腊哲学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记载，苏格

<sup>①</sup> 不难举出可以佐证此观点的例子。例如，天文学理论可以准确地预测日食和月食等现象，但却没有政治学理论能成功预测 2001 年美国的“9·11”事件。

<sup>②</sup> 简明起见，凡普遍共识和可通过网络公开获取的信息均不列明出处。

拉底基于其对科学原理和三段论的兴趣<sup>①</sup>，开创了普遍定义（universal definitions）和归纳论证（inductive arguments）。而亚里士多德本人不仅是杰出的哲学家，还是科学研究的前驱。他建立了包括天文学、化学、物理学、生物学、植物学和动物学在内的多个自然科学学科。在《论天》（*De Caelo*）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著名的“地心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地球静止，太阳和月亮等星体皆围绕地球公转。亚里士多德并非第一位提出“地心模型”的人。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托勒密提出“地心模型”要早于亚里士多德。但亚里士多德首次通过观察和逻辑推理来论证“地心模型”，这样的论证方法更贴近现代科学。具体体现在，亚里士多德通过观察月食，发现地球投射在月球上的阴影是圆形，加之“能投射出圆形阴影的必然是球体”的逻辑推理，得出了“地球是一个球体”的结论。亚里士多德的这个观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12世纪被神学家和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纳入了天主教体系之中。

亚里士多德对科学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多种研究对象上，还体现在研究方法上。柏拉图是首位使用“方法”（method）这一术语的哲学家，但亚里士多德给“方法”赋予了技术上的定义——包括检验调查过程；区分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推理、发现与证明；从经验到原理（由果及因）与从原理到结论（由因及果）的推理过程（McKeon, 1966）。此外，亚里士多德建立了系统的逻辑学，为科学推理奠定了基础。如若没有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科学将难以取得

发展与进步。康德甚至断言，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自其诞生之日起的两千年里都未曾变化，并且永不改变（Hintikka & Sandu, 1996）。纵然这种说法有失偏颇，但毋庸置疑，亚里士多德在科学研究方法等方面作出了空前绝后的贡献。

## （二）科学革命

在中世纪教会的统治下，科学研究基本循着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围绕亚里士多德的自然观点进行分析。这个时期的科学家通过研究文本（如讨论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而非观察和/或实验去了解自然（Goddu, 2010）。一直到16世纪，哥白尼提出“日心说”——认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才对“地心说”提出了正式的挑战。哥白尼一反以往的方法，通过观察行星的运动得出其理论。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撼动了“地心说”，科学革命由此开始，自然科学开始偏向采用经验研究方法——一种如今科学家仍在使用的研究方法。在这个意义上，科学革命也是一场研究方法的革命。

哥白尼提出“日心说”的100年后，伽利略打造了一台天文望远镜，为哥白尼的“日心体系”提供了经验依据。伽利略数理能力强，并且极善修辞和推理。例如，亚里士多德认为重物下落得更快；伽利略则认为，忽略空气阻力，所有物体以同样的速度下落，不受物质本身重量的影响，并且不需要做实验便可以论证。伽利略对这个问题的论证是归谬法（*reductio ad absurdum*）的经典应用范本。假设所有物体都由相同的物质构成，则其重量比等于其体积比。Finocchiaro

<sup>①</sup> 此处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记载的现代译法。“科学”一词的拉丁文原意为“知识”（*scientia*）。“科学”一词在14世纪后才开始被频繁使用，在19世纪中后期才具有现代的内涵。

(2005: 390) 将伽利略的论证过程改述如下:

“如果重物下落得更快, 大者就比小者下落得快。如果将两者绑在一起, 下落快的物体会被下落慢的物体拖慢, 下落慢的物体会被下落快的物体牵引加速, 于是组合体比大者单独下落时要慢, 比小者单独下落时要快。因此, 如果重物下落快成立, 则两个不同大小的同质物体绑在一起的组合体, 会比重者单独下落得慢, 比轻者单独下落得快。但是两个物体绑在一起时, 重量最大。因此, 如果重物下落快成立, 则这个组合体应该比重物单独下落时还要快。因此, ‘重物下落快’的假设推出了两个自相矛盾的结论——组合体既比重物单独下落慢, 又比重物单独下落快。”

这只是伽利略众多精彩论证中的一个, 更多相关描述参见 Finocchiaro (1980)。这类逻辑推理逐渐成为科学家们的重要工具。伽利略的论证还被纳入了思维实验的框架。爱因斯坦也运用思维实验进行过精彩论证, 其想象自己乘坐着一束光的相关论证脍炙人口。

和伽利略同期的培根奠定了科学革命的哲学基础。Laudan (1968: 19) 将培根的贡献恰如其分地总结为:

“在超过 200 年的时间里, 培根被认为是现代实验科学的创立者、现代哲学之父, 以及归纳法的创造者。培根对科学哲学的革命性贡献正如牛顿对物理学的革命性贡献, 他与牛顿齐名。”

培根认为, 归纳是知识的基础。实验对于探索自然的真理具有重要意义。实验的作用在于检验理论, 并提供经验事实依据。总之, “培根首次清晰地阐明了现代科学方法中蕴含着不同于亚里士多德式的逻辑” (Salmon, 1967: 2)。

培根逝世 35 年后, 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他

便是未来著名的数学家——笛卡尔。笛卡尔在其生活的年代里的诸多重要科学领域, 如力学、光学和生理学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作为一位哲学家 (或更准确来说是形而上学家), 他因那句“我思故我在” (Cogito, ergo sum) 而广为人知。这句话是指我们不能怀疑自己的存在, 因为当我们怀疑时, 我们必须思考, 而当我们思考了, 便意味着我们存在。这句话是笛卡尔追求绝对确定 (absolute certainty) 的结果, 绝对确定是知识建立的基础。笛卡尔对认识论满怀好奇, 在兴趣的驱动下, 笛卡尔在科学方法上获得累累成果。例如, 不同于培根的归纳优越论 (inductivism), 笛卡尔创造了一种假设演绎法 (hypothetico-deductive method) 的变体, 许多科学家仍然在使用这个方法 (Lauden, 1966)。根据这种现代形态的假设演绎法, 科学研究应该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假设, 通过可观察到的数据对假设进行检验。如果检验结果与假设预测相反, 则其结果推翻了原有的理论; 如果检验结果与预测一致, 则其结果证实了原有的理论。

牛顿是科学革命完成的标志性人物。在人们的一般印象中, 他几乎是空前绝后的科学家和数学家。但少有人知道的是, 在牛顿生活的年代, 他还被称作是“哲学家”或“自然哲学家”。“科学家”一词直到 19 世纪才首次出现。在 1833 年 6 月英国科学促进协会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的一次会议上, 哲学家威廉·休厄尔 (William Whewell) 类比从事艺术的人称为“艺术家”, 提出从事科学的人应该称为“科学家”, 而非“哲学家”或“自然哲学家” (Snyder, 2011)。从那以后, 哲学和科学两个领域的学者便被明

确地区分开来。即使从现代意义上来看,牛顿也并非不适合被称作“哲学家”。他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是一本复杂的著作,其内容从自然法则到上帝对世界的影响都有涉及。科学方法的性质散布于这本书的各个章节,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尽管学者们对其神秘的甚至是随意提到的观点存在许多争论,但不可否认的是,牛顿的每个观点“都被科学家和哲学家们当作是无上智慧的宝石”(Laudan, 1968: 23)。

### (三) 维也纳学派

距今大约一个世纪,科学方法迎来了科学革命后又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次的革命性进步来自维也纳学派(Vienna Circle)。这个学派活跃于1924~1936年,由维也纳大学杰出的哲学家和科学家组成。学派成员一周左右会面一次进行探讨。当时学派的领头人为莫里茨·石里克(Moritz Schlick)。这个学派试图根据当时科学的最新进展(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重新审视科学的哲学基础。20世纪30年代德国纳粹政府上台时,许多成员被迫流亡美国,并在美国的大学任教,维也纳学派最终走向解散。尽管如此,维也纳学派对哲学,特别是对科学哲学的影响巨大而深远。

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不断变化,学派提出的哲学观点也在渐渐变化。人们常常将维也纳学派与逻辑经验主义(logical empiricism)、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或新实证主义联系起来。《科学世界观:维也纳学派》(*The Scientific World Conception: The Vienna Circle*)中写道,维也纳学派的宣言本质上是在两个主张的基础上建立起科学世界观(Sarkar, 1996: 331):

“第一个主张是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直接感知经验是知识唯一的来源,这规定了正当科学的范围。第二个主张是以逻辑分析为标志的科学世界观。这个世界观认为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对经验进行逻辑分析,达到统一科学的目标。”

维也纳学派将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区分开来。逻辑和数学命题是分析命题。逻辑和数学的真命题没有任何经验内容,不能得出事实真理(factual truths)。相反,综合命题在某种意义上可由经验验证,因此综合命题具有认知意义。综合命题形成的知识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维也纳学派认为,在科学研究中只有先验的分析命题(如逻辑和数学命题)和后验的综合命题(如科学命题)具有意义。“上帝使人拥有自由意志”等形而上学的命题是无意义的,不属于科学的范畴。维也纳学派的科学观可以用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的格言来简单概括——“无法被证实或证伪的,不是科学”(1883 [1960: 587])。

近些年,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哲学观点遭到了猛烈批评。例如,其关于命题的有意义性的观点“太狭隘了,武断地排除了经验可验证性之外的东西”(Blumberg & Feigl, 1931: 294)。一些哲学家甚至提出了一个令人生畏的结论:“无疑维也纳学派哲学已死是一个真命题(Haller, 1982: 25)。”维也纳学派的观点确实有一些不足,但这并不能抹杀其对科学哲学的贡献。在当时的科学发展水平下,学派中百家争鸣、富有活力,推动了经验主义进入现代科学研究范畴。

科学哲学发展的步伐并不因维也纳学派的解散而终止。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和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是维也纳学派之外的两位著名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

《科学发现的逻辑》(*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提出了可证伪性是区分科学与伪科学的标准。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阐释了科学如何在革命性的变化中发展。现有的管理学文献频繁引用库恩提出的科学哲学术语“范式”(paradigm)(Burrell & Morgan, 1979; Donaldson, 1995; Mathieu & Chen, 2011; Pfeffer, 1993; Romani, Primecz & Topçu, 2011)。可以看出,库恩的观点在管理学界可能更为流行<sup>①</sup>。

### 三、哲学对管理研究的贡献

从上一部分中可以看出,西方科学与哲学的发展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涌现出了一批在科学(现代意义上)和哲学两方面都成就斐然的人物,如亚里士多德和笛卡尔。毫无疑问,哲学能够帮助科学家解决本体论或认识论的相关问题。在后续部分将以笔者已发表的文章为例,简要讨论哲学如何在方法论和概念性问题方面对管理研究作出贡献。

#### (一) 方法论

哲学对管理研究的贡献大多属于方法论范畴。Locke(1689 [1996: 3])认为,哲学可以作为清道夫,打扫通往知识的道路,清除路面的垃圾。在《泰阿泰德篇》(*Theaetetus*)中,苏格拉底使用著名的助产士类比,认为智慧实际上存在于人们自身,他只是协助人们产生智

慧(Benardete, 2006: 1.13-1.14)。与之类似,在管理研究中,哲学的作用也是帮助人们运用自身的智慧来解决研究问题。科学家们常常在方法论上遇到障碍,哲学通过消除这些障碍来协助实质研究(Bhaskar, 1978)。

Tsang和Kwan(1999)是笔者的第一篇哲学基础文章。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回应一个相当普遍的质疑,即在社会科学中无可能进行复制研究。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复制研究以在相同条件下进行实验或实证研究为前提;自然科学具备这一前提,而社会科学并不具备,没有两种社会情况是完全相同的(Machlup, 1988)。Tsang和Kwan(1999)提出了反驳:即使在自然科学中,也不可能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重复之前的实验。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控制那些相关的条件。因此,能否实现复制只是一个程度的问题。不可否认,自然科学的复制研究比社会科学更容易实现。在社会科学领域,如果大多数相关的社会条件都得到了控制,我们便可以认为已经进行了成功的复制<sup>②</sup>。

复制通常被分为两种:①复制;②延伸的复制(Brown & Coney, 1976)。Tsang和Kwan(1999)提出了一种更详细的分类。我们在两个维度上将复制分为六种类型:①分析检查;②数据再分析;③精确复制;④概念延伸;⑤经验的普遍化概括;⑥普遍化概括及延伸。这种分类可以更好地指导研究者进行复制研究。

<sup>①</sup> 可能因为“范式”一词听起来很“酷”,它如今有些被滥用了,具有了多种含义。例如,Donaldson(1995)在区分结构权变理论、种群生态理论、制度理论、资源依赖理论、代理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六种理论时,认为每种理论都是一种范式,在文章中混用了“理论”和“范式”两个概念。笔者感觉很少有管理学者真正读过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这本书,更何况库恩本人也并未在书中清晰地给出“范式”的定义。Masterman(1970)发现库恩书中的“范式”有21种不同的用法。在使用一个哲学名词之前,必须彻底理解其含义——使用任何核心概念都应当如此。

<sup>②</sup> 对本节中所举的例子,笔者只在文章中做简单的论证,感兴趣的读者可阅读原文。

我们对复制研究的主张最近在管理领域引起了关注。2016年《战略管理杂志》(SMJ)有一期关于复制研究的特刊, Bettis等(2016)改编了我们的分类。

笔者的另一篇文章(Tsang, 2006)运用哲学检验了理论的行为假设。这篇文章的核心思想源自一场对交易成本经济学(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TCE)的经验支持程度的争论。Ghoshal和Moran(1996: 40)对TCE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尽管大量经验研究发现资产专用性和内部化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相关关系并不能推至因果关系。关系专用性资产(例如, 距离、惯例)可以降低内部协调成本, 这是在排除机会主义假设的情况下可以得出的结论。”

Williamson(1996: 55)针对上述批评回应称, TCE是“一个经验验证的成功故事”。哪一方的观点才是正确的? 这个问题促使笔者深入探究TCE的经验检验方法。

在计量经济学中, 结构模型和简化模型是有区别的。结构模型能够表示出因变量与各个层次上的自变量的关系, 简化模型则只能表示因变量与最终的自变量之间的净影响或总体关系。假设有结构模型如下:

$$z=f(x, y) \quad (1a)$$

其中

$$x=g(u), y=h(v) \quad (1b)$$

将式(1b)代入式(1a)得到以下简化模型:

$$z=\varphi(u, v) \quad (2)$$

这两个模型在方法论上有两个关键差异(Bunge, 1997)。首先, 式(1b)包含中间变

量 $x$ 和 $y$ , 而式(2)不包含中间变量。简化模型减少了中间变量, 比结构模型更简单浅显。其次, 结构模型可以推导出简化模型, 但简化模型不能推导出结构模型。原因是根据简化模型推导结构模型是一个有无数个答案的反问题(inverse problem)。在做了大量的文献调查之后, 笔者发现大多数TCE经验研究运用了TCE的简化模型。这些研究忽略了一些关键中介变量, 如机会主义等行为假设的变量。Ghoshal和Moran(1996: 40)指出, 用简化模型去研究资产专用性和内部化之间的关系, 忽略了机会主义假设。我将这样的研究方法称为“忽略假设的检验方法”。因为从简化模型推导结构模型有无数个答案(Bunge, 1997), 所以用简化模型做的检验未必能为理论中的结构模型提供显著的经验支撑。TCE主要依靠“忽略假设的检验方法”支撑, 不可能是“一个经验验证的成功故事”。事实上, 除了TCE研究, 还有许多研究用的也是“忽略假设的检验方法”。为了纠正这种错误, 笔者在文章中特别强调, 管理研究者应该采用“包含假设的检验方法”(即检验结构模型); 而且在理论发展的早期阶段, 更应严格采用这种方法(Tsang, 2006)。“包含假设的检验方法”能够为理论提供更严格的经验支撑。

## (二) 哲学与概念性问题

哲学可以解决管理研究中的概念性问题。下面以创业机会的存在模式问题为例。自柏拉图提出形式论(theory of forms, 也译为相论)以来, “存在”一直是哲学本体论的核心主题。哲学可以游刃有余地解决“存在”的概念性问题。管理学界对创业机会存在模式的激烈争论始于Shane和Venkataraman的《创业研究领域



的前景》(2000)。这篇开创性论文指出,创业现象的核心特征是“发现并利用可盈利机会”(p. 217)。这种认为创业机会客观存在的“机会发现论”为创业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机会发现论”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许多学者并不认同“创业机会客观存在,创业者只是发现了机会”这一观点(Alvarez et al., 2014; Davidsson & Wiklund, 2009; McMullen et al., 2007)。Görling 和 Rehn (2008: 101) 写道:“他们假设机会是简单存在的……却没有阐释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一批学者提出了“机会创造论”:机会不是客观存在的实体,而是由创业机制内生创造的(Korsgaard, 2011; Wood & McKinley, 2010)。其核心思想是:“机会并不客观存在,是创业者通过制定过程(process of enactment)创造了机会(Alvarez et al., 2013: 307)。”

“机会发现论”和“机会创造论”都明显存在着致命的缺陷。“机会发现论”认为,创业者发现了创业机会,然后加以利用。从其定义上讲,被发现的机会必然是有利可图的。因此,在创业机会被发现的那一刻,其营利性就已经确定了,不需要通过开发利用体现出来(Ramoglou & Tsang, 2016)。而“机会创造论”者普遍认为,在创业者通过制定过程创造机会之前,机会并不存在(Alvarez et al., 2013)。一个反例就足以推翻这一普遍说法。事实上,很容易举出反例。许多创业机会都不是由创业者创造的,而是来自经济或社会的某些结构性变化。例如,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出现了新商机(Colvin, 2020)。Alvarez 等(2013)可以放弃上述的普遍观点,承认有些机会是创造出来的,而

有些机会是被发现的。然而,他们将面临一个艰巨的任务,即明确区分这两种机会,描述两者的关系,以及填补“机会发现论”的致命缺陷(Ramoglou & Tsang, 2017)。

笔者的文章(Ramoglou & Tsang, 2016: 411)基于现实主义科学哲学,通过阐明创业机会的存在倾向模式,从本体论上恢复了创业机会的客观性。我们将创业机会定义为“引入新产品或服务来满足市场需求以实现利润的倾向”。我们的“机会实现论”提供了一个直观的、不自相矛盾对机会客观存在的理解。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就在创业领域引发了进一步争论(Alvarez et al., 2017; Berglund & Korsgaard, 2017; Braver & Danneels, 2018; Davidsson, 2017; Foss & Klein, 2017)。这篇文章受到了一些挑战。有些挑战源于对我们观点的误解。正如前文所说,管理研究者的哲学知识往往非常有限,有所误解并不出奇。目前我们的文章还没被挑出任何实质性的缺陷<sup>①</sup>。

#### 四、一些哲学学习建议

本部分是一些学习哲学的经验。人们可能会问:“除了能在管理期刊上发表哲学基础文章,学习哲学有什么好处?”就我个人而言,我十分享受阅读哲学带来的智能刺激。除了这个抽象的好处之外,哲学还能帮助管理研究者提出更严谨的论点,更容易发现其他论点的错误。我的两位合作者——Kai-man Kwan (关启文)和 John Williams 都是专业的哲学学者,我注意

<sup>①</sup> 笔者鼓励读者仔细检查“机会实现论”,如有错误,请与笔者联系。

到在理论化方面他们比我敏锐得多。另外，哲学使我们对领域中存在的问题更加敏感。近来，基于 Davis (1971) 兴起了一场“有趣的研究运动”。其文章标题为《非常有趣！走向社会学的现象学和走向现象学的社会学》。这篇文章认为伟大的理论都必须是有意义的，而有趣来自反直觉，即“似乎是 X 的却不是 X”或“被接受为 X 的实际上不是 X” (p. 313)。笔者十分诧异，这样的文章竟然获得了管理杂志编辑的认可。当时有些溢美之词这样说道：“Davis (1971) 的‘有趣的索引’提供了唤起读者好奇心的实用方法 (Colquitt & George, 2011: 433)。”任何了解科学本质的人都应该知道，理论或实证发现是否有趣没有任何科学价值 (Tsang, 2022)。

笔者常被问到是否在本科期间系统学习过哲学。其实，笔者并没有上过任何哲学课程。20世纪90年代中叶，笔者在剑桥大学攻读管理学博士学位时，曾去旁听过彼得·立普顿 (Peter Lipton) 的科学哲学课程。这是笔者仅受到过的哲学教育。但笔者十几岁时便爱上了西方哲学，通过经年累月的阅读，笔者逐渐积累了丰富的哲学知识。自2011年以来，笔者一直在澳大利亚、日本、中国香港、中国大陆、新加坡和美国等国家和地区举办名为“为什么企业研究者应该学习逻辑（和哲学）？”的研讨会<sup>①</sup>。一些与会者反映，这个主题下少有博士生的入门读物，也少有供管理研究者使用的参考资料。这一诉求促使笔者在2017年出版了《管理研究哲学》(The Philosophy of Management Research)。对于想要深入了解哲学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是

一个很好的起点，但远远不够。笔者想强调哲学学习中的两个关键问题。

首先，西方哲学的范围很广，包含许多高度相关的分支。科学哲学是与管理研究最相关的分支。学习科学哲学需要具备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知识。而要学习形而上学和认识论，至少需要了解自苏格拉底以来的西方哲学史。另外，初学者必须掌握逻辑学的基本知识，若能懂些语言哲学则更佳。

其次，哲学观点比管理观点复杂、晦涩。Popper 的《科学发现的逻辑》(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 (1959) 是哲学领域的经典著作；Cyert 和 March 的《企业行为理论》(A Behavioral Theory of the Firm) (1992) 是管理学领域的标志性著作。相比起来，管理研究者更容易理解后者。当然，有人会反驳说，这个比较并不恰当，管理研究者之所以更容易理解管理学著作，是因为其接受过相关的训练。但即使撇开这个因素，阅读哲学著作对背景知识和理解能力的要求依然很高。Popper 是少有的以清晰写作而闻名的伟大哲学家，黑格尔、海德格尔、尼采和维特根斯坦等众多哲学家的作品都非常晦涩难懂。

因此，要掌握哲学基本知识，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当然，读几本书或几篇论文也只能掌握一些基本知识，而不能通晓哲学。若你自信能勇闯“知识储备关”和“理解能力关”，那就可以开始阅读 Russell 的《哲学问题》

<sup>①</sup> 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每年都会组织一次教师培训研讨会，帮助教师在商学院传授和推广这门管理研究哲学的课程。笔者认为这非常有助于培养中国管理研究者对哲学的兴趣。

(*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 (1912 [1997]) 了。这本书是分析哲学的经典著作，短小精悍，对管理研究者大有裨益。读完这本书，你应该就能知道自己对哲学是否感兴趣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你可以开始阅读哲学史，如 Russell (1945) 和 Scruton (2002)<sup>①</sup>。而后要学习科学哲学，笔者推荐从 Chalmers (2013) 《科学是什么?》开始。感兴趣的读者还可以继续阅读 Popper、Kuhn、Hempel、Carnap、Lakatos、Feyerabend 等哲学家的原著。至于社会科学哲学，笔者推荐 Fay (1996)。主流的哲学观点有许多种，如实证主义、现实主义、建构主义、解释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管理研究者可以选择其中一种作为研究的总体指导，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深入阅读。笔者选择了批判现实主义。

最后，学习哲学道阻且长，要长期保持兴趣需要一个更平衡的阅读方法。笔者的阅读范围并不局限于晦涩的分析哲学，大陆哲学（如存在主义）也给予了笔者许多精神力量。卡缪的存在主义著作对笔者年轻时候的性格产生了深刻影响。如今的新冠肺炎疫情也使笔者想起了卡缪在《黑死病》(Camus, 1948) 中的预见。另外，苏格拉底是笔者钦佩且模仿的道德榜样，但笔者承认自己是个不太优秀的学生。笔者常用苏格拉底的一句名言来诚示自己：“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接受编辑：Haiyang Li

收稿日期：2021 年 5 月 11 日

接受日期：2021 年 11 月 11 日

作者简介：

Eric W. K. Tsang (曾荣光, Email: ewktsang@utdallas.edu), 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纳文金达尔管理学院杰出教授。剑桥大学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组织学习、战略联盟和企业家精神。曾教授在管理研究方法论的哲学分析方面成果突出，著有《管理研究哲学》。

### 参考文献

- [1] Alvarez, S. A., Barney, J. B., & Anderson, P. 2013. Forming and exploiting opportunities: The implications of discovery and creation processes for entrepreneurial and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Organization Science*, 24 (1): 301-317.
- [2] Alvarez, S. A., Barney, J. B., McBride, R., & Wuebker, R. 2014. Realism in the study of entrepreneurship.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9 (2): 227-233.
- [3] Alvarez, S. A., Barney, J. B., McBride, R., & Wuebker, R. 2017. On opportunities: Philosophical and empirical implication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42 (4): 726-730.
- [4] Aristotle. *De Caelo* (translated by Stocks, J. L.). <http://classics.mit.edu/Aristotle/heavens.html>.
- [5] Aristotle. *Metaphysics* (translated by Ross, W. D.). <http://classics.mit.edu/Aristotle/metaphysics.html>.
- [6] Benardete, S. 2006. *The Being of the Beautiful: Plato's Theaetetus, Sophist, and Statesman*.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7] Berglund, H., & Korsgaard, S. 2017. Opportunities, time, and mechanisms in entrepreneurship: On the

<sup>①</sup> 如今在互联网上有许多免费的哲学讲座。

practical irrelevance of propensiti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42 (4): 730–733.

[ 8 ] Bettis, R. A. , Helfat, C. E. , & Shaver, J. M. 2016. The necessity, logic, and forms of replication.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7 (11): 2193–2203.

[ 9 ] Bhaskar, R. 1978. *A Realist Theory of Science*. Hassocks, England: Harvester Press.

[ 10 ] Bhaskar, R. 1998. *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 (3rd ed. ). New York: Routledge.

[ 11 ] Blumberg, A. E. , & Feigl, H. 1931. Logical positivism. *Journal of Philosophy*, 28 (11): 281–296.

[ 12 ] Braver, L. , & Danneels, E. 2018. Propensities return us to the discovery–creation debate about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43 (4): 812–815.

[ 13 ] Brown, S. W. , & Coney, K. A. 1976. Building a replication tradition in marketing. In Bernhardt, K. L. (Ed. ). *Marketing 1776 – 1976 and Beyond*: 622 – 625. Chicago, IL: 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

[ 14 ] Bunge, M. 1997. Mechanism and explanation.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27 (4): 410–465.

[ 15 ] Burrell, G. , & Morgan, G. 1979. *Sociological paradigms and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Hants, England: Ashgate.

[ 16 ] Camus, A. 1948. *The Plague* (translated by Gilbert, S. ).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 17 ] Chalmers, A. F. 2013. *What is This Thing Called Science?* (4th ed. ). St. Lucia,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 18 ] Chia, R. 1996. The problem of reflexivity in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Towards a postmodern science of organization. *Organization*, 3 (1): 31–59.

[ 19 ] Colquitt, J. A. , & George, G. 2011. Publishing in AMJ–Part 1: Topic choic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

*nal*, 54 (3): 432–435.

[ 20 ] Colvin, G. 2020. Coming out of a crisis, the boldest companies win. *Fortune*, June 25. <https://fortune.com/2020/06/25/coronavirus-business-opportunities-spending-mergers-acquisitions-research-development-recruiting/>.

[ 21 ] Cyert, R. M. , & March, J. G. 1992. *A Behavioral Theory of the Firm* (2nd ed. ). Malden, MA: Blackwell.

[ 22 ] Danermark, B. , Ekström, M. , Jakobsen, L. , & Karlsson, J. C. 2002. *Explaining Society: Critical Realism in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Routledge.

[ 23 ] Davidsson, P. 2017.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as propensities: Do Ramoglou & Tsang move the field forward?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Insights*, 7: 82–85.

[ 24 ] Davidsson, P. , & Wiklund, J. 2009. Scott A. Shane: Winner of the global award for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33 (2): 131–140.

[ 25 ] Davis, M. S. 1971. That’s interesting! Towards a phenomenology of sociology and a sociology of phenomenology.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1 (2): 309–344.

[ 26 ] Donaldson, L. 1995. *American Anti-management Theories of Organization: A Critique of Paradigm Prolifer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7 ] Fay, B. 1996.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Oxford: Blackwell.

[ 28 ] Finocchiaro, M. A. 1980. *Galileo and the Art of Reasoning: Rhetorical Foundation of Logic and Scientific Method*. Boston, MA: Reidel.

[ 29 ] Finocchiaro, M. A. 2005. *Arguments about Arguments: Systematic, Critical and Historical Essays in Logical The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30 ] Foss, N. J. , & Klein, P. G. 2017. Entrepreneurial discovery or creation? In search of the middle ground.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42 (4): 733–736.

- [31] Ghoshal, S. 2005. Bad management theories are destroying good management practic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Learning and Education*, 4 (1): 75–91.
- [32] Ghoshal, S., & Moran, P. 1996. Bad for practice: A critique of the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1 (1): 13–47.
- [33] Giddens, A. 1976. *New Roles in Sociological Methods*. London: Hutchinson.
- [34] Gieryn, T. F. 1983. Boundary-work and the demarcation of science from non-science: Strains and interests in professional ideologies of scientis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 (6): 781–795.
- [35] Goddu, A. 2010. *Copernicus and the Aristotelian Tradition. Education, Reading, and Philosophy in Copernicus's Path to Heliocentrism*. Boston, MA: Brill.
- [36] Görling, S., & Rehn, A. 2008. Accidental ventures: A materialist reading of opportunity and entrepreneurial potential.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Management*, 24 (2): 94–102.
- [37] Haller, R. 1982. New light on the Vienna Circle. *Monist*, 65 (1): 25–37.
- [38] Hicks, S. R. C. 2011. *Explaining Postmodernism: Skepticism and Socialism from Rousseau and Foucault* (Expanded ed.). Loves Park, IL: Ockham's Razor Publishing.
- [39] Hintikka, J., & Sandu, G. 1996. A revolution in logic? . *Nordic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Logic*, 1 (2): 169–183.
- [40] Huff, T. E. 2017. *The Rise of Early Modern Science: Islam, China, and the West* (3r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41] Isaacson, W. 2008. *Einstein: His Life and Univers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42] Korsgaard, S. T. 2011. Entrepreneurship as trans-
- lation: Understanding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through actor-network theory.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 23 (7–8): 661–680.
- [43] Kuhn, T. S.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44] Laudan, L. 1966. The clock metaphor and probabilism: The impact of Descartes on English methodological thought, 1650–65. *Annals of Science*, 22 (2): 73–104.
- [45] Laudan, L. 1968. Theories of scientific method from Plato to Mach: A bibliographical review. *History of Science*, 7 (1): 1–63.
- [46] Lieberman, S. 1992. Einstein, Renoir, and Greeley: Some thoughts about evidence in sociolog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 (1): 1–15.
- [47] Locke, J. 1689.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Abridged and edited by Winkler, K. P. 1996. Indianapolis, IN: Hackett Publishing.
- [48] Mach, E. 1883. *Die Mechanik in Ihrer Entwicklung*. Leipzig: Brockhaus. Translated by McCormick, T. J. 1960. *The Science of Mechanics*. Chicago, IL: Open Court.
- [49] Machlup, F. 1988. Are the social sciences really inferior? *Society*, 25 (4): 57–65.
- [50] Masterman, M. 1970. The nature of a paradigm. In Lakatos, I., & Musgrave, A. (Eds.).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59–8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51] Mathieu, J. E., & Chen, G. 2011. The etiology of the multilevel paradigm in management research. *Journal of Management*, 37 (2): 610–641.
- [52] McKeon, R. 1966. Philosoph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method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27 (1): 3–22.
- [53] McMullen, J. S., Plummer, L. A., & Acs, Z. J. 2007. What is an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8 (4): 273–283.

[54] Numagami, T. 1998. The infeasibility of invariant laws in management studies: A reflective dialogue in defense of case studies. *Organization Science*, 9 (1): 2–15.

[55] Perrow, C. 1994. Pfeffer slip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 (2): 191–194.

[56] Pfeffer, J. 1993. Barriers to the advance of organizational science: Paradigm development as a dependent variabl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8 (4): 599–620.

[57] Popper, K. 1959.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New York: Harper & Row.

[58] Ramoglou, S., & Tsang, E. W. K. 2016. A realist perspective of entrepreneurship: Opportunities as propensiti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41 (3): 410–434.

[59] Ramoglou, S., & Tsang, E. W. K. 2017. In defense of common sense in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Beyond philosophical extremities and linguistic abus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42 (4): 736–744.

[60] Resnik, D. B. 2000. A pragmatic approach to the demarcation problem.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31 (2): 249–267.

[61] Romani, L., Primecz, H., & Topcu, K. 2011. Paradigm interplay for theory development: A methodological example with the Kulturstandard method.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14: 432–455.

[62] Rosenthal, R., & Rosnow, R. L. 1984. *Essentials of Behavioral Research: Methods and Data Analysis*. New York: McGraw-Hill.

[63] Rousseau, D. M., Manning, J., & Denyer, D. 2008. Evidence in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al science: Assembling the field's full weight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through synthes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2

(1): 475–515.

[64] Russell, B. 1912 [1997]. *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5] Russell, B. 1945.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66] Salmon, W. 1967. *The Foundations of Scientific Inference*. Pittsburgh, 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67] Sarkar, S. 1996. (Ed.) *The Emergence of Logical Empiricism: From 1900 to the Vienna Circle*.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68] Sayer, A. 1992. *Method in Social Science: A Realist Approach*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69] Scruton, R. 2002. *A Short History of Modern Philosophy: From Descartes to Wittgenstein* (Second ed.). New York: Routledge.

[70] Shane, S., & Venkataraman, S. 2000. The promise of entrepreneurship as a field of research.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5 (1): 217–226.

[71] Smiddy, H. F., & Naum, L. 1954. Evolution of a “science of managing” in America. *Management Science*, 1 (1): 1–31.

[72] Snyder, L. 2011. *The Philosophical Breakfast Club*. New York: Broadway Press.

[73] Taylor, F. W. 1911. *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Publishers.

[74] Thomas, D. 1979. *Naturalism and Social Science: A Post-empiricist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75] Tsang, E. W. K. 2006. Behavioral assumption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7 (11): 999–1011.

[76] Tsang, E. W. K. 2013. Is this referee really my peer? A challenge to the peer-review process.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quiry*, 22 (2): 166–171.

[ 77 ] Tsang, E. W. K. 2017. *The Philosophy of Management Research*. New York: Routledg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and published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78 ] Tsang, E. W. K. 2022. That's interesting! A flawed article has influenced generations of management researchers.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quiry*, in press.

[ 79 ] Tsang, E. W. K. , & Kwan, K. M. 1999. Replication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organizational science: A critical realist perspectiv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4 ( 4 ) : 759-780.

[ 80 ] Williamson, O. E. 1996. Economic organization: The case for candor.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1 ( 1 ) : 48-57.

[ 81 ] Wood, M. S. , & McKinley, W. 2010. The production of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A constructivist perspective.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4 ( 1 ) : 66-84.

# Contents

## Why Philosophy Can Help Management Research

Eric W. K. Tsang

(Naveen Jindal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Abstract:** In this essay, I attempt to answer the question: Why can philosophy help management research? I tra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hilosophy and science ever since science was founded by Aristotle. The intimate relationship indicates the important role played by philosophy in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Since management is a social science discipline, philosophy could play a similar role. Based on my own publications, I discuss the contributions of philosophy to management research in terms of methodology and conceptual arguments. I share my experience of studying philosophy and provide some suggestions to readers who are also interested in having a deeper knowledge of philosophy.

**Key Words:** philosophy; management research; methodology; science; logic